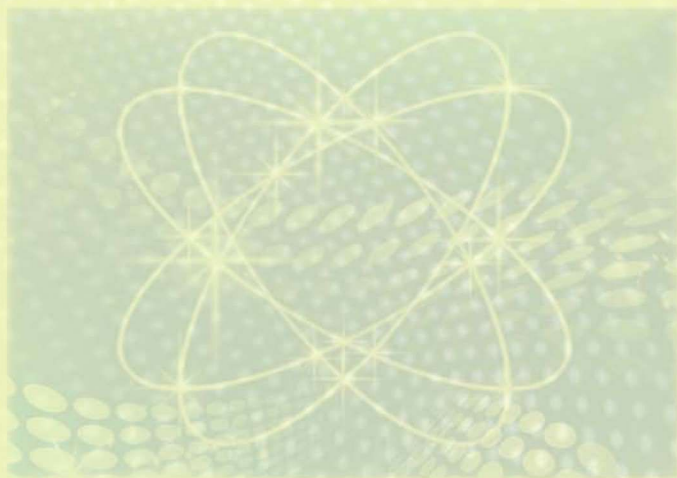


了解回族



目 录

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白寿彝
中国回族研究的历史轨迹(上)	高占福
中国回族研究的历史轨迹(中)	高占福
中国回族研究的历史轨迹(下)	高占福
回族与中华文明	李兴华
回族文化的反思	李佩伦
论回族文化的源与流	周传斌
回族道德浅论	梁向明
我的回族文化基因	沙叶新
试论“回族武术”	马明达
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杨志玖
回回名源古今论	马肇曾
元代的回回军士及其活动	马建春
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	路伟东
东北地区回族源流考述	那晓波
回族学学科体系刍论	姚继德
华夏大地上的回回民族	马启成
论回族对国家的新贡献	马明良
对回族民族凝聚力的一种理论假设	段继业
城市界面下的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杨文炯

论回族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金宝

试论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 许宪隆

论回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赵杰

回族现象观察的“点”与“面”

——从三本回族调查资料的研究取向谈起 张中复

回族起源的 DNA 证据 谢小冬 陕雪梅

《天方性理》所反映出的回回宇宙观 陈久金

校点本《回回药方》前言 冯增烈

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中的回回医方的考证 宋岷 宋莉

论宁夏回汉团结四十年 振魏

八十年来回族教育的回顾 杨兆钧

冀鲁边区(渤海)回民支队初创时期遇到的几个特殊问题 王连芳

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与社会变迁

——对海南省三亚市羊栏镇两回族村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察 马建钊

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建回族社区

——以晋江市陈埭镇回族七村为例 蓝炯熹

宁夏城市回族婚姻现状调查研究

——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 杨志娟

银川市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马宗保 金英花

中国回族的“普埃布洛”

——甘南临潭西道堂尕路提大房子研究 马平

土生波斯李珣 杨进

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 马明达

近百年的郑和研究 时平

中国在 1421 年发现了世界

——在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英国]加文·孟席斯主讲 马理根据录音翻译

马注的家世及生平 刘玉钊

梁檀 马明达

不尽的思念

——回忆父亲马骏烈士 马德钟

不顾一切 专诚不懈的奋斗者

——纪念革命烈士郭隆真殉难 70 周年 黄庭辉

我的母亲刘清扬 刘方清

“朶司令”马仲英其人 吴忠礼

白崇禧将军对抗日的贡献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而作 周瑞海

杨志玖先生访谈录 赵文坦 王晓欣

金茂岳先生访谈录 金茂岳口述,朱挂同根据录音整理

回族学者金祖同 郭成美

崎艺惊世 砺笔不平

——杰出的回族画家梁崎先生的艺术道路 代 林

从口述中找回历史:马长寿先生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马 强

族教之光 艺苑昆仑

——京剧艺术大师优素福·马连良百年诞辰祭言 李佩伦

中国交响乐之父

——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 李佩伦

关于马德新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桂萍

学者的墨汁甚于殉道者的血

——纳忠传略 高发元 肖 芒

书神州半世纪风云 著中国新闻史华章

——穆青新闻实践活动述评 孟歆云

锲而不舍 成果丰硕

——回族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先生 纳国昌

回族进步教授马宗融 闪克行

阿拉伯语学者马坚 纳国昌

回族爱国主义者一端木杰 王俊贵

悼念端木正教授 杨运鹏

学坛漫步话“回研” 林 松

新时期中国回族研究巡礼 余振贵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回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健彪

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白寿彝

回族史座谈会已经开过六次。过去的五次会议,我们都有不少成就,对于回族史的研究都起了推进作用。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对推动回族史的研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讲教育问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些比较宽泛的话,但离主题也不能算太远。我讲的就是如何编写一部新型历史书的体例。

这个问题,1983年我在宁夏回族简史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过。我当时的主张,是把回族史的体例分成四个部分来写,同目前流行的体例不大一样。这四个部分,我曾经说过:第一,叙说部分,是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基本资料同我们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第二,综述部分,是要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论述。这种体例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般历史书的体例。第三,典志,是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第四,是关于人物的传记。后来在1984年,我们编写《回族人物志》第一册的题记里,我又申诉这个意见。六年过去了,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逐步为不少同志所接受,认为应该这样做。我当时讲了这四个部分,感到比较困难的还是第三部分。这些专题都写什么,当时实在没有好好想,我觉得不太好想。1990年4月间,《回族人物志》的第三册编好了,我在题记里开始提到这些专题怎样写,写哪些方面。当时提了九个题目,我觉得把回族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可能都包括到了。从那以后,我又继续考虑这个问题,觉得第三部分可以写十二个方面,就是十二个问题。现在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看合适不合适。

第一,地域考。就是要写历代回族分布的情况,包含了历代的军屯、农垦同各地回族人口城乡分布。写到近现代的情况,主要还是写我们自治地方的情况。地

域考是纲领性的东西,因为它讲的是我们回族在全国的居住状况。

第二,生计考。就是经济生活方面,包含农业、手工业和近代工业方面的情况。

第三,工艺考。回族有许多工艺方面的特点如雕刻等。

第四,会社考。回族各种团体,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群众团体,一直到现在的群众团体。

第五,寺院考。包括各地礼拜寺、古今礼拜寺的情况。

第六,教育考。包括家庭教育、寺院教育、学校教育和各种社会教育。

第七,天算、历法。天文学、算学同历法,回族在这几方面都有特别的贡献,在中国科技史上有它的地位。

第八,医药、体育考。回回从外面输入的药品、医术也有它的特点。同时在体育(如武术)上也有它的贡献。

第九,礼俗考。各种风俗习惯,宗教性的、非宗教性的。

第十,经籍考。回回的各种著作,包括回民写的汉文著作、波斯文的著作、阿拉伯文的著作,还可以把不是回回作的,但是在回民教育里常用的汉文教材包含在里面。

第十一,金石考。礼拜寺的石刻、墓碑上的刻文同金属器皿上的铭文。

第十二,语文考。回回常用的宗教词汇、生活词汇,回民在语言表现里的文法形式以及“小儿锦”等,都可包含在这里面。

这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我现在所理解的看,可以说把回族史上的一些主要问题都包含进去了。但在我们实践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现新的问题。对于开发新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这恐怕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这十二个方面值得考虑,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起步,有利于工作的进行。

从全书的四个部分讲,现在的情况是第四部分回族人物志正在进行。第一、第二册已出版,第三册已编好,正在排印,第四册大概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可以完成。这一部分的四本,只能写到1949年解放,解放以后,就另外再作考虑了。因为解放以后的问题比较多,人物也比较多,可以再研究具体的办法。就是已经写好的四本回族人物志,也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稿子,等出版后希望大家不断充实、修改、提高。关于第二部分综述,实际上我们已经工作几十年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前夕,回民文化协进会提供了一本资料,叫做《回回民族的历史和

现状》，那是解放后最初写的一部回族简史。后来，又发展成为国家民委领导的五套丛书里的《回族简史》。现在的《回族简史》又修改了，马寿千等同志费了很大力气，增加了不少篇幅，提出了不少新鲜内容，所以这部分也有相当的基础。第一部分比较好办，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不用费多大力气。但是如果把这部分的范围扩大，要包含国外的著作，就要稍费点事。从这四部分情况看，第一、第二、第四部分都已经开始工作，比较困难的还是第三部分。我想，第三部分的十二个问题如果合适，或者有所增改，是否可以分别出书，一个题目一本书，这一部分写好以后，和别的部分一起修改提高，再写成一部大的新型的回族史，是否比较好一些。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要这样做，要写十二本书的时候，可以写好先出版，跟《回族简史》《回族人物志》合起来，都可以叫做“回族史丛书”，都可以看成是“回族史丛书”里面的一部分。在写的过程中，工程相当大，需要调查的材料相当多。是否可以分片，按不同地区，分别担任不同的内容。是否在西北的宁夏一个点，它负责哪几个问题，哪几部书的研究，别的方面所有成果可以集中到这里。昆明可以有一个点，把西南各省或其他地方同它担任的几部书集中起来。北京也可以是一个点，也分担一定的任务。把这十二本书都搞起来了，可出版了，下一步就可进行新型的、规模宏大的回族史，看这样好不好。

可以不叫“回族史丛书”，就叫做“回族通史”，仍按四个部分进行，把现有的有关成果吸收进去，多下一点力气把十二个方面的研究搞出来。如果平均每一方面的研究有5万至10万字，即总共有60万至120万字，加上叙说和综述30万字，人物志80万字，全书共170万字至230万字。

组织工作比较不容易，要紧的是要有专人负责，要限期完成，要陆续出版，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见自己工作的成果，对工作的开展有利。预计这些工作要加一把劲，人员要配够，要有一定的经费，五年之内是否可有一个初步的规模。这是我的初步的意见，对于写新型回族史包含什么内容，具备什么规模，怎样进行，是很粗浅的意见，不一定合适，请大家指教和研究。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最好能够逐步具体化。回想我们第一次在宁夏开座谈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刚开始大家也只能交换意见，通通消息，可现在已经有七年的基础了，我们让工作能够具体化，能够得到比较扎实的成果，似乎还是可以的。这个工作，就目前考虑是这样，回族史作为一个学科讲，工作还多得很，那就以后再说了。现在能不能先把新型回族史的设想实

现,我看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少同志在下面反映说:满族有自己的历史,蒙古族有自己的历史,大一些的历史,我们没有。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写法、进行方法也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资料比较雄厚,我们资料分散,这个困难比较大。他们有专门的机构,我们的人力比较分散。结合我们的情况,考虑我们的问题,不要把问题拖得很久,也不要急于求成。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国回族研究的历史轨迹(上)

高占福

遍布华夏大地 2000 多个县市的 900 多万回族人,以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和亦农亦商的经济特征为世人所知,更由于其“出门千里不持粮”的精神凝聚力,为历朝历代各族各界人士所称道。回族的历史,从 1300 多年来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穆斯林先民,到六七百年前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前进与成长的整个过程。同时,回族也为中国的统一进步和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段既饱经磨难和浩劫,又迎来春色满人间的历史,从这个民族的形成开始,就曾引起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人的关注。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回族社会地位的变迁,研究回族问题(包括回族唯一信奉的伊斯兰教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宽松的社会科学研究氛围,促进了回族研究领域的进展、开拓和深入,丰收的成果不断充实回族文化的机体,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增添着一页页夺目的篇章。本文拟着重阐述的内容也主要是这一时期。

一、回族研究沧桑历史的回顾

对一个民族的研究,是在这个民族形成之后,并有了社会生活的“经历”和历史过程才开始的,没有研究对象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立足。回族的形成,现在一般讲是在元末明初,那么回族研究也应从那一时期以后才逐渐开始,是可以基本认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回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回族先民来到中国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到回族形成,从回族形成至今,从时间上两者大致相等,所以在回族史的研究中,是把回族先民的历史过

程也包括在回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研究之中。这样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是,回族先民中是否存在研究回族先民历史活动的人和著述,因为当时回族作为民族共同体不可能存在,但作为穆斯林实体已活跃在华夏大地上。答案是:第一,回族先民中当时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其他民族的人中则有记载回族先民在华活动和介绍国外伊斯兰教的著述。如唐代杜环的游记体古籍《经行记》中,就有记载关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社会情况的内容。他的著述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掌、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早期回族先民的活动。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的外国、宝货等门中涉及与岭南地区有交往的大食等国情况。南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下“志物”中记载了海外各地商旅贩入中国的货物、产地、特征等,其中包括了阿拉伯人在江浙一带的商业活动。南宋人岳珂的《桯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事迹及其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建筑风格等。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非穆斯林文化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并带有作者惊异的目光和陌生的感受。但要了解元代以前回族先民在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也只能借助于这些并不完全准确的记载。从这一点看,这些著述在回族研究中有其历史价值。第二,唐朝至元代,回族先民中出现了不少文化人,有些甚至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与研究回族先民无直接关系,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很难找出穆斯林在我国的有关内容。唐代,曾一度有回族先民“诸蕃子弟皆愿入学”^[1],学习汉文化的境况,更有大食人李彦升考中进士,“当时曾有人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这件事情……这是关于穆斯林研究中国学问的最早的中文记录”^[2]。宋末,大食人后裔蒲寿晟,著有《心泉学诗稿》传世。元代,回回人才辈出,“元代回回在中国学术上,对于儒学、文章、书画、建筑等方面,都有所贡献”^[3]。文化人中,萨都刺、高克恭可与当时汉族一流诗人、画家相媲美,买闾是著名诗人,伯颜子中是建昌教授,不忽木是国子祭酒翰林学士,铁木儿塔是奎章阁大学士。回回人扎马刺丁不但依回回历法编制了《万年历》,而且参加了《至元大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全书1300卷中,扎马刺丁负责达755卷,“扎马刺丁在中国地方史上也应该是很有地位的人物”^[4]。扎马刺丁还与同时代的其他回回文化人,把阿拉伯世界包括天文、数学、化学、医药、地理、哲学等内容的学术文化传入中国。《元秘书监志》卷7《回回书籍》条中,列有这些书目。但元代最终也没有出现专门研究

回回人社会与发展状况的专门人才,也无这样的著述留传后世。第三,元代以前回族先民的历史活动,在外国学者和旅行家笔下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公元 880 年撰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又名《苏莱曼游记》)中反映了以下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1. 唐代东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开始;2. 阿拉伯穆斯林来华人数日趋增多,他们与华人和睦相处,对中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3. 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不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州,还授予了他们自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广州及其他地区得以广泛传播^[5]。这部著作是外国旅行家和学者最早涉及到有关回族先民在华活动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某些不足。蒙元时期波斯人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者史》和拉施都丁编纂的《史集》,“对研究元代回回人来源有极大帮助”,“也是研究波斯、阿拉伯、突厥民族历史及中国回回人来源和在元朝活动的重要著作”^[6]。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回回人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更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比较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非修行者的年逾 200 岁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苏非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元代在中国任职、生活过 17 年,学会使用蒙古语和汉语,任过 3 年扬州总监督并熟悉大汗宫廷礼仪和行政机构法规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71 年沿“丝绸之路”历时 3 年半来到中国,直到 1292 年才离开。由他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叫《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回回人的活动与现状,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这方面记载的不足,“是回族研究的重要资料”^[7]。这些事实表明,在唐、宋、元时期,尚未有专门研究回族先民的著述问世,但无论是中国的非穆斯林文化人,或是回族先民中的文化人,都间接地涉及和提到一些回族先民活动的人或事。比较起来,国外一些旅行家(特别是穆斯林旅行家)的游记中,对回族先民在华的状况则有着更多的记载和客观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回族研究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特点。

明代,对回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一个成熟时期,明代清真寺的

碑文对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反映更为深刻。而自胡登洲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使更多的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和回族有了普遍的了解。但这一时期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衰弱,以及信仰者“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8]的状况,重在寻找挽救危及伊斯兰教自身存在的方法和途径,在一些著述中也大都反映这种情况,而还没有把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来研究。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一批回族学者“借儒文以阐经”,弘扬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的展开,回族研究也得以整体的体现。这一时期回族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舆、马注、刘智、张中、伍遵契等,皆为回族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虽主要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教律和倡导伊斯兰教及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但由于历史形成的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回族特别是江南一带回族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并且为回族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三部论述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哲学思想的著作。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包括了伊斯兰教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内容。刘智的《天方典礼》,涉及到哲学、政治、法律、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在全书 20 卷中,后 10 卷基本上论述以江南回族为蓝本的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如财货、饮食、婚娶、丧葬等。张中的《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则是介绍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认主学理及认主实践方法的译著。伍遵契的《归真要道译本》,一直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本。明末清初回族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从形式上看大都具有“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9]的特点,但在实际内容上,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回族等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水平,同时对当时回族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境界也进行了分析。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一批回族学者在研究回族伊斯兰教的领域施展才华,大大推动和丰富了回族研究的内容。马德新(字复初)、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才,他们的研究著述无论在内容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明末清初的回族学者。马德新一生从事学术活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译著达 35 种,举凡教义、教典、教律、宗教哲学、阿拉伯文法、天文、历史、地理、诗歌无不包含在其著作中。他的重要著作《四典要会》以“其所得于天方者,与东土所存之典故,合而参之,揭精拔萃,约为典章”^[10],书中吸收、融化、改造了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素材和概念,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回族前辈学者的思想,拓宽并延伸了回族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他的《醒世谏》《逻辑》《天方历法》等著作,与回族的社会生活有着一定的关

系。马联元是回族经堂教育的研究和倡导者,他首创汉文和阿拉伯文双授学堂,用阿拉伯文写成《讨绥赫》《四篇要道》《性理本经》《教典经法》,还有阿拉伯文法、波斯文法读本等,并用汉文写成《辩理明证》。他的《亥厅译解》和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是《古兰经》在中国最早的汉文选译本之一。马联元的成就与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可见,明末至清代的回族研究大都是在研究伊斯兰教的形式下出现的,专门研究回族的完整的著述目前难以断定是否有过。当时的回族学者们又比较多的集中在南京、云南等地,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中原大地鲜有专门的研究者,也无著述传之于世,这与这些地区回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但客观地来评价,明末清初以回族学者为主体的“借儒文以阐经”的学术研究,虽然在研究的面上和内容中有众多的局限,但毕竟“是回族穆斯林第一次进行的阐发伊斯兰教义、教律、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的宗教学术活动,是回族穆斯林进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和建设工作”^[11]。“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12]。对回族的整体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

清代的回族研究中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官方的奏折、记事,以及民间一些文人的见闻、经历记述中,由于回族人民不断出现的反清斗争,各地的清地方官员以及当地的一些文人,甚至派去镇压的清高层官员,对回民反清斗争的始末、“善后”,乃至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的上奏和记述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明显的是为清政府的统治服务,但同时也留下了当时回族社会实际状况的记载,这对我们客观分析清代回族社会是有一定价值的。这类史书为我们熟知的有《钦定兰州纪略》《循化志》《钦定石峰堡纪略》《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滇乱纪略》《钦定云南回匪纪略》《清咸同间云南回变纪闻》《龙蛇泪痕》《滇垣十四年大祸记》《秦陇回务纪略》《平定关陇纪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回纪略》等,大量的地方志书也记载有回族反清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史料。这些虽非研究成果的史籍,在去其糟粕的基础上,对我们了解清代的回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而这也是唐宋至清代以前,历朝历代记载回族先民和回族社会生活所没有过的一个特点。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回族研究,呈现出文化团体不断涌现、民族学术和文化教育刊物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人才成长壮大、学术研究波及全国的特色。

1907年,以“注重启迪回民”^[13]为宗旨的回族第一份白话文报《正宗爱国

报》由回族人丁宝臣创办。同年,留学日本东京的38名回族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在1908年创办了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本旨”^[14]的第一份回族刊物《醒回篇》,倡导民族教育,振奋民族精神。1917年,北平成立“清真学社”,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同教之感情,共助学问之进步”,以达到“学术研究而愈理,宗教因可藉以昌明,社会国家亦胥获补益”^[15]的目的。1925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宗旨中有“翻译经典,编辑书报,宣讲教义;创设学校,设立藏书室”^[16]等学术内容。1928年,北平各大学回族同学联合组织“伊斯兰学友会”,会员遍布全国15个省的30多所大学和中学,其中有多名女会员,是当时回族最高知识阶层的青年学术团体,至1933年改名为“回族青年会”,但亦非纯粹的学术团体。1938年白寿彝、杨敬之等人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了以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员中包括了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一批回族学者,如纳忠、马坚、哈德成、庞士谦、马宗融等,积极开展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和译著活动,出版10余种回族伊斯兰文化丛书,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回族学术团体之一。1931年,南京还成立过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为宗旨,成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回族青年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并设有专门的“回民学术研究会”^[17]。此外,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还陆续成立了以普及伊斯兰文化、倡导新式回民教育、提高回民文化素质为特点的回族教育团体,兴办了一批回民新式教育学校,创办了各类回族刊物,也进行对以回族教育为主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其中“成达师范学校”及其主办的《月华旬报》影响最大。在中国回族最集中、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1913年就成立了“兰州回教劝学所”;1922年,青海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1929年,“中国回教会陕西分会”成立;1934年,“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成立,西北各主要省份先后都成立了文化教育团体。同年,在西安还成立了以“阐明回教教义,以文化活力融合回汉情感,使回民之向心力集中于国家为宗旨”^[18]的“西北回教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化教育团体的成立,对推动回族文化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加深对回族问题的研究,都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其成员中的部分人,成为以后回族研究的重要力量。

民国时期,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表现在多领域的各个方面,虽然大部分著述是从信仰和宣传的角度研究撰写的,但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和文章。《古兰经》在这一时期有多种汉文通译版本问世,1929年12月铁

铮译《可兰经》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1931年3月姬觉弥总纂的《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1932年2月回族学者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由北平中国回教促进会出版;1943年刘锦标的《可兰经附传》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1947年8月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出版。尽管对这些译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如赵振武认为铁铮、姬觉弥的译本“非回教人所译,大率为欣赏文艺之作”。而王静斋的译本“则为回教人自作,其文学方面之价值如何姑不具论,要其措词立言,自较真切。”^[19]对刘锦标的译本,马坚先生斥之为:“借附传之机,加进‘大东亚共荣圈’等与经典毫无关系的内容,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张目之嫌,从而大损译本的声价。”^[20]但《古兰经》其他通译本的出版,对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意义。

自清末至1936年,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一批回族伊斯兰教译著和著述不断得以问世,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纳子嘉的《伊斯兰教》,天津伊光报社出版王静斋的《伟嘎业》,北平秀贞精舍出版杨仲明的《回教要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自成的《历源真本》等。1940年以后,白寿彝先后发表《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等著作,并撰写了《赛典赤·赡思丁考》《回教先正事略》《明末回教史家张忻》《读桑原鹭藏〈蒲寿庚考〉札记》等学术文章,从而奠定了其回族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带头人的地位。而随着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和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等著作的出版和当时一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文章的发表,使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陈垣为代表的汉族学者,和以马坚、白寿彝为代表的回族学者,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使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一个符合时代进步精神的新阶段,开拓了客观的真正意义上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新领域。

民国时期,随着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回族有志之士先后兴办了一批批“以阐发教义,提倡教育,沟通、传达各地回民消息为主”^[21]的回族文化和研究刊物,截至1949年,回族创办的刊物先后达100种以上。这些刊物创刊的时间不同,地区各异,存世的日期也长短不一,但“它们不同程度地介绍了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及各地回族伊斯兰教概况,收集了不

少濒于散失的回族伊斯兰教史料,发表了不少改革宗教和教育的文章,宣传中外大事,宣扬爱国与爱教的一致性,对揭露反动军阀、御用文人的民族歧视行为等都起过一些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它们在爱国主义方面的宣传,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值得肯定的作用。这些刊物还为开展回族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提供了一席之地。”^[22]北京、云南、天津、镇江、奉天、上海、广州、西安、香港、辽宁、常德、桂林、泰安、河南、江苏六合、南京、汉口、开封、青海等地,都有回族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的传播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珠江流域首推《天方学理》,长江流域则推《突崛》《晨熹》《华族》,黄河流域一带主要是《伊光》《月华》《成师校刊》《伊斯兰青年》,黑龙江流域为《醒时月刊》。《月华》的发行传播最广,国内外最有影响^[23],常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宗教刊物进行交换。

民国时期的回族研究中,1941年在延安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名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有着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从其出版到1980年以前,这本书对研究中国回族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对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起过的特殊历史作用是不能完全忽视的。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执政者和相当一部分人,“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不但许多汉人怀疑回回是否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回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回回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回答”^[24]。书中“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历史”^[25]。这本书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本旗帜鲜明的以探讨“回回民族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民国时期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较之以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新特点是对回族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古兰经》有了多种版本的汉文通译本,使《古兰经》从宗教职业者的书斋走进更多的回族家庭,对回族社会产生了更为广阔、深远的影响,并且为学术研究者深层次探讨回族问题提供了权威性的著述。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教育文化为重,逐渐拓展到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回族刊物的不断创办和各种著述的出版,以及各地回民学校的出现和发展,突出表现了教育推动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又促进教育水平提高的可喜局面。同时,国外伊斯兰文化译著全译本的不断出版发行,使人们对回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有了更多